
审美过程研究

——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

〔联邦德国〕 W.伊泽尔 著

霍桂桓 李宝彦 译 杨照明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By Wolfgang Iser

本书根据英国伦敦卢特莱支与吉甘·保罗出版社1978年版译出

审美过程研究

——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

〔联邦德国〕W. 伊泽尔 著

霍桂桓 李宝彦 译

杨照明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10.5插页2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260 000 册数：1 4 000

ISBN 7-300-00502-0

C·26 定价：2.90元

MS 12/04

译者前言

每翻译一部有价值的外国学术著作都需要写《译者前言》。但是，就摆在大家面前的这部接受美学的最主要著作《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①而言，我们却不打算叙述它的内容，而只想把有关这部著作的一些背景知识简要叙述一下，帮助读者自己去阅读和研究这部著作。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节省篇幅，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读者精湛的钻研去形成自己对于这部著作的相应观点；这样做完全符合接受美学、特别是符合本书的作者沃尔夫冈·伊泽尔的一贯主张——虽然读者通过这样做，得到的不是对这部著作中所包含的“体验”，而是对自己研究美学、研究文艺理论，以及研究艺术欣赏的有益启发。

作为一个以研究读者接受文学艺术作品为注意中心的新兴美学流派，接受美学是于本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联邦德国的康斯坦茨崛起的。人们一般认为，这个学派最主要的理论代表之一，汉斯·罗伯特·姚斯在1967年发表的论文：“作为向文学理论挑战的文学史”是接受美学正式诞生的宣言。而伊泽尔1969年在康斯坦茨大学所作的讲演《本文的召唤结构》（这篇讲演于1970年以德文出版），奠定了他作为接受美学学派另一个最重要理论家的地位。此后，接受美学在西方、以及在东欧学术界的影

^① 这是原文的标题，本译著以之为副标题，而以“审美过程研究”为正标题，详见后面说明；另外，为行文简洁，本《译者前言》凡提到本书仍只称《阅读活动》。

响日益扩大。近年来，接受美学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有不少报刊发表了有关介绍性文章；在这种情况下，向广大国内读者译介接受美学的重要理论著作，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从理论观点来看，接受美学所针对的，主要是19世纪以来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处于主要地位的、带有浓厚的实证主义色彩的文学理论。具体来说，这种文学理论具有以下要义：第一，把人和文学艺术作品的关系等同于人与客体的关系。认为文学作品是独立自足的，是完全独立于欣赏者而存在的客体。第二，认为读者与文学作品的关系和人与认识对象的关系完全相同；作品的总体形象、意义、价值都是自身固有的，是一成不变的要素，读者欣赏作品必须从这些要素出发；评论家在欣赏、评论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必须尽可能抛弃一切主观因素，以保证评论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而文学的唯一存在方式是作家的创作活动及其结果——作品，其他则是次要的。第三，就文学作品的历史接受而言，作品的审美效果和作品的地位是由它自身的思想内容和审美内涵决定的；因此，通过考察作品的内容以及作者所处的时代状况，人们就可以确定作品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与这种理论观点针锋相对，接受美学指出，第一，文学作品只有通过读者阅读才能充分获得自身的存在，离开了阅读主体，它只能是潜在的、不完全的。第二，只有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才能在读者的主观意识中作为审美客体而存在；只有通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参与本文^① (text) 中所叙述的事件、通过本文和读

① “本文”是现象学美学，解释学美学以及接受美学的核心概念；在伊泽尔这部著作中，它指的是作家创作的结果，即我们通常所谓“作品”，是需要通过读者的阅读、体验而获得作品存在价值的文学实体。本译著运用这个词以区别于“文本” (document)，后者系指一堆相互之间没有直接关系的文献材料。因此，本译著不以这个术语表示“这篇文章”或“这部著作”，特此说明。

者的相互作用，作品的内容才能转化成为形象、意义、价值、以及审美效果，这些东西不可能是依赖于主体的、一成不变的要素；评论家所处的地位和其他读者完全相同，他欣赏、评论文学作品不可能完全剔除主观因素，因此，尽管读者之间对作品的评价各有特色，但由于其中包含着可以为大多数人理解的结构，所以它们都能够成立；就艺术创作而言，作家创作艺术作品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作品在读者参与再创造的过程中产生了审美效果，它才能真正获得现实存在，所以，创作并不是中心，真正的中心是欣赏。第三，应当从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看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历史接受。处于不同时代的读者，由于欣赏语境(context)不同，所以，读者欣赏同一部文学作品所获得的整体形象、审美效果、以及价值观也各不相同。这样，通过从文学理论的所有重要方面反对上述理论，接受美学就实现了文学理论从以研究本文为中心，向以研究读者接受为中心的转移。因此，它不仅拓展了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而且把具体研究读者对艺术作品的欣赏和接受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对美学、艺术评论、艺术欣赏研究的具体发展无疑会造成重大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它得到了人们日益广泛的重视。

以上只是从宏观角度概括叙述了接受美学的理论背景和它的主要观点。具体来看，虽然同是作为接受美学学派的最重要的理论代表，但是，伊泽尔和姚斯又各有千秋。这主要表现在他们理论研究的渊源、侧重点、具体思想都有很大不同。首先，从理论渊源来看，姚斯主要受当代哲学解释学创立者，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及其代表作《真理与方法》的影响；伊泽尔的直接理论来源则是波兰现代著名现象学美学家——罗曼·英伽登的美学思想；其次，就具体的理论研究而言，姚斯从探讨文学史转向研究接受理论(reception theory)，他研究的注意中心一直放在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研究读者接受文学作品方面；伊泽尔则在继承

了新批评派、叙述理论、尤其是在继承了英伽登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研究重心一贯放在读者欣赏过程中发生的、本文和读者的相互作用方面；他并不忽视在欣赏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因素和历史因素，只不过把它们具体运用到研究本文—读者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了；伊泽尔从这里出发强调指出，人们不应当称他的理论为“接受理论”，而应当称之为“响应理论”（theory of response）^①，本书原副标题就源出于此。有人把姚斯和伊泽尔的理论研究分别称之为对读者接受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这基本上是合乎实际的。也正因为如此，人们要研究考察接受美学，就必须涉及到伊泽尔及其美学思想。再次，从他们各自的理论发展来看，虽然姚斯的研究视野保持从宏观角度研究读者接受的一致性，但是他的“接受理论”是通过不断推陈出新、不断提出新观点新概念向前发展的；而伊泽尔的“响应美学”思想则严格地保持着前后一贯性，他的后期著作只是对其前期著作的深入展开，并且更加精益求精。《阅读活动》就是伊泽尔最新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论著作，因此，说它是接受美学的经典著作并非夸大其辞。

沃尔夫冈·伊泽尔，1926年7月22日生于德国的马林堡，以专攻英国语言文学而成为这方面的专家，1970年以后又成为接受美学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从研究英国语言文学这个方面来说，他1960年出任联邦德国威尔茨堡大学教授，撰有《瓦尔特·帕特：美学的自主》一文，于1960年出版；在此之前，他曾经专门研究英国18世纪小说家亨利·菲尔丁，撰有《亨利·菲尔丁的世界观》一文，于1952年出版。顺便说一下，在《阅读活动》一书中，伊泽尔每每以菲尔丁及其作品为例证来具体阐发他的观点，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样做的根据。1963年，他出任西德科隆大

① 参见本书“前言”。

学教授，而从1967年起，他一直担任康斯坦茨大学的教授，并且在欧洲和美国许多大学中讲过学。在这段时间内，他研究的重心仍然在英美语言文学方面，曾经重点研究美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在研究进程中，伊泽尔的兴趣逐渐从英美语言文学转移到研究小说的响应结构（Wirkungsstruktur）和接受美学（即他的“响应美学”〔Wirkungsästhetik〕）上来。1969年，他在康斯坦茨大学作了题为《本文的召唤结构》的著名演讲，翌年以德文出版，题为《本文的召唤结构·不确定性作为读者响应文学散文的前提条件》；1971年，J. 希里斯·米勒在他编著的《叙述面面观》一书中收入了这篇文章的英译文，题目是《在散文虚构中不确定性和读者的响应》。这篇文章奠定了伊泽尔作为接受美学主将的地位。1972年，伊泽尔以分析具体文学例证为主的重要接受美学著作——《隐含的读者：从班扬到贝克特长篇小说的交流结构》的德文版，在慕尼黑由威尔海姆·芬克（Wilhelm Fink）出版社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两年以后，这部著作的英译本由伦敦的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1975年重印；1978年出版平装本，1980年平装本重印，可见其影响之大、传播之快了。在当代西方有关文艺理论的著作中，只要涉及到伊泽尔及其接受美学思想，无不提到《隐含的读者》，大家公认它是接受美学的重要著作之一。目前，译者正在翻译这部著作，不久即可问世。但是，与《阅读活动》相比，《隐含的读者》在理论方面则逊色一些。

《阅读活动》是伊泽尔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理论著作。美国当代评论家罗伯特·C.哈鲁伯曾经指出，伊泽尔理论思想的发展前后一贯、万变不离其宗，他的后期著作只不过是對他前期著作的进一步展开。所以，与其说他的后期著作和他以前的观点相左，还不如说是对以前的思想更加精益求精。“因此，如果人们要研究伊泽尔过去十多年对接受理论的贡献，那么只需要读他的

代表作就可以了。”^① 这种看法基本上符合实际。就《隐含的读者》和《阅读活动》相比较而言，前者侧重对具体例证的分析，后者则侧重从理论上进行分析论证；因此，就研究伊泽尔的接受美学思想来说，首选著作当推《阅读活动》，因为它集伊泽尔的所有研究成果之大成，集中、系统、全面、充分地体现了他的接受美学思想。也正是这一点奠定了《阅读活动》作为接受美学经典著作的地位。西方出版家评论说：“对于那些有志于研究阅读过程，研究美学理论，研究文学评论，以及研究小说的基本理论的人来说，它是一部极其重要的理论著作。”

《阅读活动》德文版首先于1976年问世。1978年，这部著作的英文版由伦敦以出版学术名著著称的卢特莱支与吉甘·保罗出版社出版，本译著所依据的正是这个版本；与此同时，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本书的英文版。这些版本的出现和广泛传播，使它的影响超过了《隐含的读者》，成为最集中反映伊泽尔接受美学思想的理论著作。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们要研究接受美学，就必须涉及伊泽尔；而要了解和研究伊泽尔的美学思想，最好的途径莫过于阅读和研究这部《阅读活动》。

为了给读者阅读这部著作、研究伊泽尔的美学思想提供“参照系”，下面再简单叙述一下国内外对伊泽尔其人其书的评价，以及译者个人的看法。

接受美学是一个新兴美学流派，因此，国外对它尚未作出有价值的评论；就国内的情况而言，目前对它尚处在介绍阶段上。目前我们看到的比较全面系统地评述接受美学的著作，是罗伯特·C.哈鲁伯的《接受理论》^②。但是，通过读他的著作我们会发现，

① 参见罗伯特·C.哈鲁伯(Robert C. Holub)：《接受理论——批判导论》(伦敦和纽约，1984年第一版)，第三章第二节。

② 《接受理论》有中译本，已于1987年9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尽管哈鲁伯把伊泽尔誉为与姚斯同等重要的接受美学“双星”之一，并且比较详细地叙述了《阅读活动》的基本思想；但是，他对伊泽尔接受美学思想的评价却处处给人留下了贬低后者研究成果的印象。由于国内还没有出现有关伊泽尔美学思想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哈鲁伯的观点也影响了国内一些人对伊泽尔响应美学的看法，以致于要么在论述伊泽尔时匆匆一带而过，要么认为伊泽尔的理论“并无多少创新”^①；这种看法、做法恐怕是有欠公允的。

译者认为，伊泽尔通过《阅读活动》一书所论述的接受美学思想，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我们的研究有启发：第一，伊泽尔通过具体研究文学本文和读者的相互关系，把这种关系看成是动态的，引进并具体阐述了“本文—读者相互作用”这个概念，这就打破了人们以前只把艺术欣赏看成审美静观的习惯。显而易见，这不仅实际上造成了文学理论研究艺术欣赏视角的转变，而且也研究方法从“静止”到“运动”，由“机械”到“辩证”的转化迈出了有重要意义的一步，因此他的研究是一种可贵的理论探索。第二，伊泽尔通过具体研究本文—读者相互作用，反复强调读者要参与本文所叙述的事件；认为读者只有体验了这些事件，才能获得新的经验，得到审美享受，同时本文也才能作为现实的艺术作品而存在。这不仅贯彻了接受美学反对把艺术欣赏过程等同于认识过程的主导思想，而且他也从自己独特的角度把美学中极为重要的基本问题之一——认识与审美的关系问题提了出来，并且通过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探索，通过具体研究突出强调了审美体验及有关问题。第三，通过具体研究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欣赏，伊泽尔不仅使接受美学实现文学研究重心转移的理想落到实处，他在研究中还广泛涉猎了言语—活动理论，心理分析理论，系统

^① 参见《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一书的“译者前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以及国内关于接受美学的部分文章。

论，格式塔心理学，存在主义，交流理论等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且把现象学美学和解释学美学的观点和方法运用到具体研究之中。不论他通过这样做取得了多大进展，这种综合多学科研究成果的努力已经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借鉴。关于伊泽尔研究成果更具体的评价，留待读者自己去得出，而且以上这些看法仅供参考。鉴于伊泽尔这部著作是从美学高度对读者欣赏文学作品活动过程（从美学角度看，即是审美过程）的具体研究，因此为了使标题更好地反映其理论的精华，译者特以“审美过程研究”为本书的正标题，而以原文的标题“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为副标题；另外，译文中“第…部分”、“第…章”、“第…节”字样系译者为使眉目清楚而加，特此一并说明。

至于伊泽尔响应美学的不足之处，译者以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宏观上来看，它的理论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尽管这一点不如姚斯的理论明显，同时他也随时注意摒弃“主观任意性”。这突出表现在，他没有能正确说明文学整体、尤其是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欣赏、体验与现实的关系。这不仅使他的具体结论时有偏差，而且也从根本上对他取得更大进展造成了不利影响。第二，就具体研究来说，他的理论视野过于狭窄。这表现在，他只是具体研究读者对叙述性文学本文的欣赏，尤其偏爱那些与现实唱反调的文学本文；而没有涉及读者对更广泛的文学体裁的欣赏；这样，他研究本文一读者相互作用所得出的结论就难免带有局限性。第三，伊泽尔在论述过程中，运用了大量没有经过明确限定的术语；这就要求人们在阅读、研究他的这部著作时，必须根据“语境”仔细体会这些术语的含义，当然，这同时也给读者理解他的思想带来了困难。这些都是译者个人的初步看法，相信读者通过阅读本书会得出更公允的评价。

本书是合作的产物。李宝彦参加翻译了本书的第一、二部分；霍桂桓翻译第三、四部分，并对译文的风格作了统一。由于伊泽

尔这部著作源于英伽登的现象学美学，并且吸收了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哲学解释学的方法论成果，涉及了许多学科领域，运用了大量术语，其中有些术语如“剧目”（repertoire），“策略”（strategies）等等，都是较新的用法，所以，译者只好勉为其难，一方面尽力译通，同时也注意避免使人望文生义造成误解。在翻译过程中，个别疑难之处曾向我们敬重的师长，英文专家杨照明先生请教过，承蒙他尽心指点，并且牺牲春节休息时间统校全书，谨此表示衷心感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的司有峯老师曾经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和物质上的帮助；同时，美学教研室的王旭晓老师也给予了热心帮助，谨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译者本人学术水平有限，所以，这部译作虽然经过细心揣摩，多次校订，错译、误译之处仍然会很多，诚恳希望读者专家不吝赐教，以待改正。最后，我还要深深地感谢曾在本书校订过程中提出过宝贵意见的本书责任编辑赵福琪同志；深深地感谢为使这部粗糙的译稿成为汉译学术著作而付出了大量心血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们。

霍 桂 桓

一九八八年四月于中国人民大学

前 言

一个文学本文只有在被读者阅读的时候，才能产生一种响应。因此，如果不分析这个阅读过程，那么要描述这种响应^①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研究的焦点是阅读，因为阅读引发了整整一系列活动，这种活动不仅依赖本文，而且也依赖人类某些基本能力的锻炼。效果和响应既不是本文的特性，也不是读者的特性；本文所提供的是一种潜在的效果，在阅读过程中才得到实现。

本文和读者作为两极，和它们之间发生的相互作用一起构成了一种文学交流理论得以建立于其上的基础（见本书第二、三、四部分）。这种理论认为，文学作品是一种交流形式，因为它冲击世界，冲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冲击现存的文学。这些冲击包括由本文剧目^②（repertoire of the text）、对这些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所引起的重新组合；这种重新组合揭示了文学交流的意图，而它的实现过程则是由一个范围宽泛的、各种特殊指令所规定的。本书论述本文的各章节（见第二部分）的主要论题是，作为一套指令的本文构成。要阐明这种阅读过程，就必须展现本

① 在德语中，“Wirkung”这个词既有“影响”的含义，也有“响应”的含义，但是没有英语单词“响应”（response）的心理学含义。用“影响”（effect）来表达“wirkung”所表示的意思往往太弱，而“响应”又有点儿含糊。经过左右为难的比较，最后我选择使用“响应”（response）这个词。

② “剧目”是伊泽尔阐述其“审美响应理论”的主要概念之一，它指的是作者从现实和以往文学中选择成份，并且将其精心整理、组织成的本文的内容侧面，为读者领会本文真实含义提供背景和指导。详见本书第三章。——译者注

文所激发起来的读者的那些基本运作^①。读者必须实现这些指令，这一事实毫无保留地表明，本文的意义就是需要他集结的东西，因此，读者集结本文意义的构造性过程就构成了论述阅读的各章节（见第三部分）的主题。但是，这两部分只描述了处于一种关系之中的两个伙伴，这种关系要把读者置于一种本文只作为一个反应物的情境之中。如果要使这种本文—读者关系真正得到实现，这种关系本身就要求有一种推动力使它运动起来；最后的各章节（见第四部分）就论述本文—读者相互作用的刺激物，这对于读者在一个再创造的辩证过程中集结本文的意义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因此，审美响应主要可以从本文、读者，及其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方面进行分析。之所以称之为审美响应，是因为尽管它是由本文引起的，但是由于它调动了读者的想象力和感知力，这样就使他能够调整、甚至区分他自己固有的注意中心。这种方法表明，人们应当把本书看作是一种审美响应理论（Wirkungs theorie），而不是一种审美接受理论（Rezeptions theorie）。如果研究文学是由我们对本文的关心引起的，那么人们就不能否认这些本文对我们产生的作用的重要性了。因此，不应当把本文看作是对现存的、或者已经存在的事物的记实，而应当看成一种对已经系统表述过的现实的再次系统表述，这种再次系统表述产生了某种以前不存在的东西。所以，一种审美响应理论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即怎样才能处理，并且怎样才能确实理解迄今为止从来没有经过系统表述的情境。另一方面，一种接受理论总是论述现存的读者，他们的反应证明了某些受历史制约的文学体验。响应理论以本文

① “运作”（operation）是一个结构主义术语；皮亚杰在其《发生认识论原理》以及《结构主义》（这两本书均有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作了充分论述。伊泽尔在此借用它，意指由文学本文引起的，读者与本文的“相互作用”。——译者注

为基础；接受理论则是由读者判断的历史产生的。

任何理论都必然会带有一种构造的性质。这一点也适用于我们现在对这种运作的描述，即通过这种运作，审美响应在阅读过程中就开始运动起来；无论如何，这种分析所提供的框架使我们能够评价制约读者们的那种对本文的个人实现和解释。审美响应理论的任务之一，是使对本文的各种解释更容易为大多数人所理解。显然，这样一种意图逆反了人们逐渐扩大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是由人们对本文的解释本身已逐渐变成一种目的这个事实所造成。一旦这些活动变成自我满足的，那些把注意的焦点集中于构成这些活动基础的假定就不可或缺了。随之而来的讲解、剖析所造成的副作用可能会促进人们对预定设想的思考，不论在阅读中，还是在解释中，这些预定设想都发挥作用。

我们这里所阐述的理论并没有经过任何经验的检验。与其说我们关心的是证明它的有效性，还不如说我们更关心这种理论有助于设计一种理论框架，以安排和指导对读者反应作经验性研究。不论现实还是历史，都没有自然而然地为我们提供无懈可击的答案。所以我们必须通过精确表述我们希望对现实和历史提出的明确问题来开展研究。但是，即使是这些问题本身也是被预先限定了的，我们也必须努力确定这些基本假定的本质、以及由之产生的结论的本质。本书所概括提出的理论的直接关联就在于此。

文学批评应当反思其批评活动，并且通过这种反思弄清楚它研究文学本文的方法，这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如果要把这样一个过程引向合乎逻辑的结论，那它就必然会引起人们考虑迄今为止几乎从来没有被触及过的各种因素。某种事物以文学本文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并且没有我们的虚构就不能产生这种文学本文（不论我们认为这些虚构是什么），如果这是确实的，那么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文学在人类整个天性中的实际功能是什么。文学批评的这个人类学问题仅仅在我们这里阐述的思维过程中得

到暗示，但是，我们希望这些暗示足以引起人们对一个重要而迄今尚无结论的研究领域的关注。

对于在1970年以《本文的召唤结构·作为读者响应文学散文前提条件的不确定性》为标题^①的一篇论文中概括表述的问题，在以下章节所阐述的思想中，对它们作了详细思考。如果我要答复由我那篇论文引起的争论，本书的篇幅就需要增加一倍^②，我有意避免把我的观点放到现存的争论中去，因为这同样要进行冗长而详尽的探讨。只是在第一章中，我力图概括叙述与现代艺术有关的历史条件，这些历史条件曾经反映了已经过时的、寻找本文意义的古典要求。在别的地方，我曾经向英伽登（Ingarden）的见解提出挑战，这并不是要贬低他的成就，而是为了表明他所关心的问题能够（而且也应当）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研究。但是我充分了解到，正是英伽登关于文学作品具体化的阐述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使我们能够获得如此之多的真知灼见——尽管其中许多见解都和他的思想相矛盾。

为了使本书不陷入完全抽象的议论，许多理论观念是通过例子来说明的，而且，实际上有些观点的含义通过例子得到了展开。这样一些具体说明并不意味着对本文的解释，而只是为了阐述得清楚明白。我有意在一个很狭窄的范围内选择例子，以避免花时间去描述它们的来龙去脉。出于同样理由，我的分析与在我的另一本书——《隐含的读者：从班扬到贝克特散文虚构中的交流模式》（“The Implied Reader: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 in Prose Fiction from Bunyan to Beckett” [1974年版]）中已

① 这篇论文以英文发表时标题是：“散文虚构中的不确定性与读者响应”，载J. 希里斯·米勒编：《叙述面面观》，纽约，1971年出版。——译者注

② 我已经在我的论文《批评之光》中回答了某些人的批评，该文载雷纳尔·瓦尔宁编：《接受美学·理论和实践》（大学袖珍本第303号），慕尼黑，1975年德文版，第325—342页。

经分析过的本文保持一致。这本书包含了我讨论这些例子所依据的所有前提。但是在这里，我们的讨论只限于能用来说明正在研究的思想的那些方面，这些思想大多不是《隐含的读者》一书的中心议题，本书中也没有采取另外的方式加以展开。几乎没有例外，这些例证都来自叙述性本文，因为这些叙述性本文为我们分析阅读活动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内容。

除了上面提到的文章之外，第三章的第一部分曾经以《虚构作品的现实：对文学的一种功能主义探讨》为题，在《新文学史》第七期（1975—1976年度）上发表过，征得编者同意并且做了一些修改之后，在这里重新发表。

如果不是承两个不同的研究机构的盛情，慷慨地授予我会员资格，本书是无法写成的：我的第一个赞助人是康乃狄克州米德尔镇威斯里安大学的人文科学研究中心，他们的盛情使我能在1970年至1971年远离高谈阔论的喧嚣而安下心来，完成本书的第一稿；我同样要向荷兰瓦森纳尔市的尼德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高级研究会表示感谢，他们在1973年至1974年为我写作我的著作的主要部分提供了理想的条件。

我还要向多伦多大学比较文学程序研究生班的学生，以及席鲁斯·哈姆林教授表示感谢，他们的邀请为我在本书中表述的思想提供了有启发性的试验基础。最后，如果没有大卫·亨利·威尔逊的耐心和语言方面的造诣，这个英文译本不可能问世，我要对他赋予一部德语现象学著作以英语化的形式表示无尽的感谢。